

近来读书,发现古代一些名人读书妙法颇多,常以“三”字做归纳总结,“三余”“三上”“三到”,细细品味,颇有趣味,受益匪浅,不妨辑录下来,时时体悟,深得其中奥妙。

三余。《魏略·儒宗董遇读书的典故:董遇少时家贫,每次去山中打柴,都要带着书籍诵读,他哥哥嘲笑他,但董遇还是不改初衷,坚持投闲习读。有读书人向董遇求学,他让人读书“必先读百遍”,并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董遇认为,只有多读,才能理解书中的要义。求学者说读书没有太多时间,董遇讲了“三余”的读书观。何为“三余”?他道:“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冬天岁尾,更深夜静,绵绵阴雨,都是闲暇之余,应当抓住“三余”之际,读读忙时没读完的书。此“三余”之妙尽在不言中,“余”味无穷也!

三上。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四岁而孤,家贫无资”的境况下,依然勤学苦读,从小到老,一直是“昼夜寝食,惟读书是务”。他读书、写作方式常独辟蹊径,得心应手。欧阳修著有短文《三上》:“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亦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钱思公(钱惟演)、谢希深(谢绛)、宋公垂(宋绶)都是当时有名的读书人,皆以文学知名一时。他们的读书方式可谓新奇别致,除了坐于书房传统的读,还躺在床上翻阅,甚至夹着书,上厕所也要琅琅诵读。欧阳修呢,他读书作文也是钟情于“三上”,即马背上、枕头上、厕所上,他认为这样读书才有韵味,才读得进去,写东西才灵感频现,构思奇妙。

三到。朱熹是南宋大名鼎鼎的读书人,他关于读书的诗句即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朱熹主张读书要带着疑问来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这是他读《诗经》时的感悟,知之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后,才感到是真正读懂了。朱熹在《训学斋规》中提及读书要“三到”,他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他认为,读书“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心思不在书本上,那么眼睛就不会仔细看,心和眼既然不专心致志,只是随随便便地读,就一定不能记住,即使记住了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然已经到了,眼和口难道会不到吗?可见集中精力读书的重要。

顾炎武总督读书

江舟

顾炎武,人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自幼勤学。在祖父鑫源公的培养下,他6岁启蒙,10岁就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祖父鑫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他说:“读书是圣人之事,现在有的读书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

件老老实实在的事,必须认真地打牢基础,踏踏实实地对它,来不得半点花架子。顾炎武开始勤奋治学,他采取了“总督读书”的读书法。

首先,自读书之始,他就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并且做到持之以恒;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再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按照这种方法,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资治通鉴》书就变成了两部;再次,他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

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顾炎武规定每天这样温习书籍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历史学家钱穆称顾炎武读书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大家风采

用中国抽象绘画诠释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创新展现中国文化。书中精选百余幅当代中国抽象画家徐冬冬完整描绘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历时八年创作的画作。以宣纸、毛笔为载体,用抽象绘画语言亲近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使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老树”发出了时代文化的“新枝”。精美装帧,高品质印刷,在品味文字同时,拥有丰富新颖的视觉感受。特别收录名家对谈,多维度解读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天地不言,总是用自己最好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存的道理,不过这一切都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感受、去觉察,用孔子的话则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们跟随《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观看大自然的更替,其实大自然也在默默观看我们的人生历程。大家不妨携手一起,在节气的交替中,在《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诗情画意里感悟生命,体会中国人的诗意生命美学,把平淡的日子过成诗和远方。

节气里的诗情画意

——读《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甘武进



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是中华历法对四时变化的概括,也是一首简明、纯真、亲切、充满生活气息的对于天地、对于神州、对于中华民族、对于先祖、对于中国人生命能量的颂歌、情歌。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即太阳到达黄经315度时。《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描述立春节气与初候“东风解冻”,意思是说,天地阴阳之气的继往开来由立春开始,春木之气,也就是消融冰冻、催生万物的阳气,由此开始主宰天地。

“郊岭风追残雪去,坳溪冰水送破

冰来。”如果说立春是春的建始,那么雨水就是真正气象意义上的春天的到来。“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水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雨水节气的解释堪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这番论述极富美感,“散而为雨”,这是天地间多么美妙的景象!从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了阳气生发、春风浩荡那席卷天地的气势,消融了冻霜的苦寒,化解了残雪的余阴,阴阳二气相搏而产生的雨水散落如花,滋润着万物在初春的暖意里昂扬勃发。

竟这个相对公平。考试可以让你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作家一般是有“自由不羁”的标签的,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父亲、老师和寻常大叔的叶兆言。他并不在意别人因为他不够“不羁”而抨击教材和考试制度,对于强大的存在,他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妥协的。

再次,先生又是大格局的人。大格局来自大视野,先生的视野来自于个人修为,来自于古都南京,当然一定与他的家庭有关。

在提问环节中,先生对“请谈谈您的祖父叶圣陶先生对您的影响”一问颇不感冒。他说前不久去郑州开新书发布会,展方悬挂的条幅上赫然写着“热烈欢迎叶圣陶孙子叶兆言先生”,让他非常不爽。他说:“写了大半辈子,出了几十本书了,还被称为‘孙子’,这感觉不是滋味。”这句话里,锋芒一放即收,令我窥见先生温和中的刹那冷峻,也许是他作为先锋作家的底色吧——他彻底否认了家庭对他文学上的影响:“家里的大人都反对我学文科。关于这一点,南京的家父和北京的祖父伯父有着惊人的一致。……受家庭影响,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我考虑学什么都有可能,可以考虑数学、化学、医学,甚至林业,这都非常自然,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文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先生特殊的家庭环境,少年陪伴祖父的时光,接触的优秀人群,对他的眼界的拓宽、格局的扩展和奠定,一定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对世界的考量,一定会有更高的视点,更远的视界,更准的视角。

这样的叶兆言,才会有这样的观点。他真诚,不做惊人之语却隐有风雷之声;他有妥协,有超拔,只忠实于内心;他不以夺人眼球的方式呈现,平淡如说家常。这三个论点,其实是有关联的,核心在于第一个。

说到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先生说道:“文学就像爱情,它不是非有不可的,就像我们大多数家庭一样,没有爱情依然可以维持。但有了爱情,生活就会美好很多。”他

说,以文学的方式生活,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生活,是最适合他的生活。他说:“别的活我干不来、不想干,唯有写作我干不厌。”他说:“写作是一场冒险,是惊悚的旅行,是一种等待,写完上一句后,你等在那里,想下一句该怎么表达,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他说:“文学并不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只是我热爱它罢了。”而能在别的工作上找到快乐和成就感的人,不一定要去从事文学,“作家就应该像普通人一样,他不应该有光环。”

叶先生常被问到:“在鲁迅面前,当代作家是否觉得汗颜?”他说他对这样的提问不以为然。他相信当代作家的成就一定会被认同。他说他对“伟大”、“崇高”、“自由”、“道德”这类的光鲜的大词保持警惕,对“深刻”保持警惕。他真诚地看着后排的学生们,温和地告诫,作文要真实,不要想着拔高,你的阅历、厚度、高度和宽度,还不足以让你具有冲击出珠穆朗玛的能量和能力,而强行拔高就像拼命给一个气球充气,即使不爆裂,也让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内在的空洞。转而他又告诫在场的写作者——这时候的语气却是带着一点冷讽的——他说,不要模仿小孩说真话,其实没有皇帝,不要拿那个不存在的皇帝说事,要真实,真诚地、谦卑地感受这个世界,不要装腔作势,不要以伪装的深沉来掩盖自己的浅薄和躁动。你得老实,你呈现出来的越真实,你就越深刻。你理解不到的深刻,会有别人或后人帮你理解。

由一个钳工成为一个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无疑是一个励志人物,但在他的整个讲演中,“享受文学”、“远离名利”、“让文学远离成功学”却是提的最多的短语。在回答“如何将一篇小说改好,发表出来”的提问时,叶先生的嘴角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微笑,他说,在写之前,你认真做了准备;写之中,你全情投入;写之后,你通篇打量,做了修改,那么你就享受了过程,能不能发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谈到对“地域文化对小说的影响”时,

叶先生的回答也是惊骇四座。他说,我认为没有多大关系,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企图以地域文化来讨巧是没有前途的。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你文字自带地域的信息,不必刻意追求。这是一个与大多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不一样的观念。

考量两个提问和两个回答,叶先生的文学态度清晰起来:忠实,享受。他回忆起自己刚刚从事写作的那几年,眼神温情起来。他说他最初的小说是在台历上的,那一年暑假,他一口气写了八个中篇,而且都发出来了,自认为极有文学天赋。可是接下来的整整五年,他写了更多的小说,却没有一篇发出来。他焦虑,怀疑,失去信心,就像困在笼子里的狮子。

“会不会是您祖父特意嘱咐各杂志社,不发表您的作品,以磨练您?”有人这样发问。这个说法让我想起张居正。张居正两岁识字,五岁入学,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参加乡试,以其才华,必然挂桂登科,但作为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为了铸造“国器”,却故意让他落选,使他遭遇挫折,潜心自省,以防骄傲自大,目空一切。

叶兆言笑了。他说,没有那么多鸡汤,文学不是成功学。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我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但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沉寂的五年,让我那颗躁动的心沉静下来。我平静下来,做了深刻的内省,我明白我是从心里热爱文学的,我离不开它,那么只有无怨无悔,不管能不能发表。这是五年,而不是前五年,让我彻底爱上了文学,将这一生许给文学。我相信久爱、深爱一定会清洁自己、感动对方,太容易得手反而没意思。

“我说这个,并不是励志,而是告诉大家,爱是单纯的,因而才是美好的。文学要远离成功学,就像女孩子一定要嫁给爱情。”

说,叶先生微笑着看着大家。他的卧垂眼慈和淡然。

台上台下一片寂静,然后被一阵由衷的掌声打破。

叶兆言

文学要远离成功学

董改正

叶兆言先生来小城做了一场关于文学的讲演。先生自谦“说的没写的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先生不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他的叙述是缓慢的,如同深静的河水,没有卷起千堆雪的激越。他是全程微笑着的,端坐着的,没有过多的肢体语言来互动现场和他自己的表达。这是一场让人安静的讲演,听热闹的人或者会恹恹欲睡,但思维一直紧跟并积极思考的听众,一定会感受到平静中的力量。

苏童这样评价先生:“儒家的,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有旧文人的气息”。

在小城的礼堂里,我听到的叶先生,却并非如此。先生在全场讲演中,主要有三个论点:一、文学应远离成功学。二、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三、请不要刻意深沉。围绕这几个论点,先生没有惊人之语,却以平淡的语气说出,显示出深厚的学养和大气气象,也显示出先生的另一面:他是一个心有猛虎的人——只是这头猛虎雄踞于现实之上,凛凛地打量着这个繁复的世界。

这些论点并非标新立异。

首先,先生是个平常人。女儿日记里的叶先生,会跟我们一样焦虑,跟我们一样与下一代有代沟和战争,会说出“你以为我没打过你,就不会打你吗”这样的话。会与我们一样糊涂,对前途并无理性的安排,考大学是因为“当工人并不好玩,成天和机器打交道”。会与我们一样贪玩,以至于大学毕业的时候,留言簿上全是“你真会玩”“你真是个好活的人”之类的评价。会跟我们一样小富即安,他说“那年头当个工人,基本上已经是个白领了,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是钳工”。

其次,先生是个诚实的人。他说“我建议学生们认真读好语文课本,不用看太多的世界名著,一是因为理解不了,二是因为课本规范,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首先是要应付高考”。“高考嘛,就是这个硬道理,过关万岁。”他认为考试没什么不好,他说:“我不是个善于与他人打交道的人,我喜欢考试,毕